

清末中国民众私塾就学率的考察

胡学亮

A Study of Private School Enrolment Ratios in the End of Ching Dynasty

HU Xueliang

China's old-style private schools had been major peopl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efore the modern schoo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However, the level of popularity of the private schools has not been clear by education researcher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In this paper, using local records of private schools of various regions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n china's population, try to calculate the rate of private school enrollment in that time.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o be explored in the paper. Firs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in private schools according to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private schools. Second, it defined private school-age period and calculated the number of private school-aged children. Third, it estimated private school enrolment ratios of some counties in the end of Ching Dynasty and discussed this result.

一、前言：问题所在

小论以中国近代教育成立之初民众教育普及率为研究对象，根据教育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统计资料，考察和推算这一时期中国民众初等教育普及率尤其是启蒙私塾的就学率。

众所周知，从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发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十年间，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导入和成立的重要时期。“钦定学堂章程”尽管是中国当局最初颁布的近代教育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因而又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由此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各地开始得到真正实施。但是由于教育经费、师资以及作为旧教育机关私塾本身的“便民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私塾存在的基础没有受到根本性冲击，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仍有大量私塾得以保存甚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¹⁾，因此私塾与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成立之初共同承担了普及民众教育的重任。

显然，欲考察这一时期中国民众初等教育普及率，必须同时推算民众在新式初等小学堂以及在旧教育机构私塾的就学率。对于前者，笔者曾根据相关史料推定，1907年初等小学堂全国平均就学率约为2%²⁾，对于后者即推定全国各地民众私塾的就学率却是一个困难的课题。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根据现存资料,清末全国各地到底开设了多少所私塾?在私塾就学的儿童又有多少?等问题,难以考察。尽管学部于1910年颁布了《改良私塾章程》,责成各地方官员调查私塾的办学情况及就学生数,但有关该调查的全国性统计资料至今未被发现。而这之后的每次全国教育调查都未将私塾列为调查对象。而且,由于私塾的纯私人性质等原因,清末民初的地方志及族谱也几乎都未记载私塾的设立、经营状况,因此要获得该时期民众在私塾就学情况的统计资料实非易事。笔者虽曾根据1929-1934年地政学院等大学毕业生以及中华民国行政院农业复兴委员会对四川、江苏等地的调查资料,计算出这些地区经营的私塾数、就学儿童数以及就学率,并以此推算二十多年前清末民众的就学率³⁾,但由于二十多年间私塾数量和就学儿童数量发生了诸多变化,30年代的私塾就学率并不能简单地反映出20多年前的就学状况。

其二,缺乏这一时期各地人口资料,尤其是人口结构方面的资料,因此各地的学龄儿童数等数据难以获得。学部虽然于1907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教育调查,“学童数”原本也是调查内容之一,但各省最终几乎都没有上报有关调查结果⁴⁾。这或许因为当时全国尚未实施户籍法,因而当时学龄儿童数的确切数据也无从获得。从先行研究方面看,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在《清末近代学制的地方渗透》论文中,曾引用《中国年鉴》⁵⁾(第二回)记载的山西、浙江、四川等省1910年的学龄儿童数,由此推算这几个省的就学率,而该年鉴既没有对调查方法又没有对至为关键的学龄儿童的年龄范围加以任何定义和说明⁶⁾,因此这一数据可信赖程度难以考证。陈宝泉在推算1919年全国义务教育普及率时,曾将各省的学龄儿童数等同于各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其依据是什么?作者亦未说明⁷⁾,因而这一数据的可信度也不免令人质疑。

鉴于上述情况,小论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各县市地方志有关私塾的统计资料,参照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在合理假设和推论的基础上,试图解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成立初期民众就读私塾的入学率。为此,小论首先根据有关私塾史料,推算全国各地启蒙私塾的平均就学规模;其次对启蒙私塾的学龄儿童进行界定,并推定全国各地私塾学龄儿童总数;最后在此基础上推算出全国各地的私塾就学率,并对其结果进行讨论和考察。

二、私塾的平均就学规模

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省、市在编纂地方志时,收集了部分地区清末开设私塾的一些统计资料。这些资料相当零碎,经整理之后就如同表1那样,15个府州县志中,只有浙江的奉化、安徽的灵璧、福建的建阳以及山东的即墨等四县既记载了清末开设的私塾总数又记载了全县私塾就学儿童数,而其它地方志仅仅只记载了当地清末开设私塾的数量。

为了推算上述四县之外其它地区私塾在校学生数,小论特作如下假设,即“浙江奉化等四县每所私塾的平均就学儿童数,与其它各县每所私塾的平均就学儿童数基本相等”。这样我们首先就可以计算出浙江奉化等四县每所私塾的平均就学人数,其结果分别是浙江省奉化县的14.8人、安徽省灵璧县的14.3人、山东省即墨县的19.3人以及福建省建阳县的5人,四县私塾数合计为1,031所,就学儿童总数为14,300人,每所私塾的平均就学儿童数约为13.9人。根据上述假设,把表1所列的其它各州县的私塾数乘以13.9,就得到了每个州县私塾在校儿童总数(即表4的“学生数”)。

表1 清末中国部分府州县私塾数及就学儿童数一览表

地名		私塾数和就学儿童数			出典
省名	县名	私塾数	就学儿童数	调查年代	
浙江	诸暨县	790		清末(~1911年)	《诸暨县志》,1993年
	岱山县	100		宣统1(1909)年	《岱山县志》,1994年
	奉化县	399	5,920	宣统1(1909)年	《奉化市志》,1994年
	普陀县	80		光绪33(1907)年	《普陀县志》,1991年
安徽	灵璧县	191	2,727	宣统年间(1909-11)年	《灵璧县志》,1991年
福建	建阳县	200	1,000	清末(~1911年)	《建阳县志》,1994年
河南	确山县	40		宣统2(1910)年	《确山县志》,1993年
	登封县	200		清末(~1911年)	《登封县志》,1990年
	新安县	393		清末(~1911年)	《新安县志》,1989年
山东	即墨县	241	4,653	光绪30(1904)年	《即墨县志》,1991年
河北	景州	420		清末(~1911年)	《河北省志》第76卷 教育志,1985年
	抚宁县	227		清末(~1911年)	
	赵县	200		清末(~1911年)	
	永平府	197		清末(~1911年)	
	望都县	71		清末(~1911年)	

以上假设主要基于上述四县分属不同省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从在清末曾接受过私塾教育的一些人士的回忆录或年谱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旁证这一结果的合理性。如出生于河北南皮县的张之洞11岁时(1837年)就读的私塾,其在校学生只有7、8名⁸⁾;苏州出生的包天笑最初就读的私塾只有2、3名学生,其后就读的私塾的在学人数达到了12、13名⁹⁾;安徽绩溪县出生的胡适也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就读的私塾规模很小,只有学生2人,而第二次就读的私塾的在校学生有十几人之多¹⁰⁾;湖南溆浦县出身的舒新城¹¹⁾以及张金鉴¹²⁾就读的私塾的学生数也都在10名之外。从上述私塾教育经验者的回忆录、年谱中,可以看出清末私塾的规模即在校学生人数大都在数名到十几名之间,这个数值虽比前面推算出的私塾平均规模13.9人要少,但两者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三、私塾的学龄儿童数

以上对几个地区的私塾办学规模以及就读私塾的儿童数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那么这些地区的私塾就学率是多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弄清楚通常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为就读私塾的年龄阶段(即私塾学龄儿童的界定)以及这一阶段的儿童数到底有多少(即学龄儿童数)等问题。

1、私塾学龄儿童的界定

学龄一般是指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由于清末中国私塾既不属于义务教育机构,全国各地私塾入学年龄和学习期限也未作统一的规定或限制,因此按学龄的通常

含义难以界定中国私塾学龄儿童性质。尽管如此,但私塾本身有其一定的教育规律,人们也有将达到什么年龄阶段的孩子送入私塾就读的共识意识、习惯或做法,因此在这里姑且将私塾学龄儿童定义为:“按照私塾本身的教育规律和人们共同的习惯,把那些达到和符合私塾教育入学年龄阶段的学生称为私塾学龄儿童”。但这样又衍生了如下两个问题,即按照私塾本身的教育规律和人们共同习惯,私塾的一般入学年龄是多少?一般在私塾学习年限又是多少?

为了弄清第一个问题即私塾的一般入学年龄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清代出生者年谱,其中记载有入学时期和入学年龄的共有60人¹³⁾,将他们按照入学年龄分类,就可归纳成表2。由此表可以看出,私塾的入学年龄不限,小到4岁大到11岁,其中6岁开始就读私塾者最多,占总数的约1/3,其次是5岁、7岁和8岁,另外5岁到8岁之间开始就读私塾的占总数的89%,也就是说清代儿童集中在5-8岁年龄阶段接受私塾启蒙教育。由于考虑到上述60人大都出身于经济富裕的中上阶层家庭,一般家庭儿童上学年龄可能比他们稍晚,故小论在这里把私塾一般入学年龄定为7岁,这可能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其次,再来考察儿童在私塾学习年限的问题。如上所述,清末的私塾对儿童的学习年限没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时候上学?学习几年?一般由家长根据儿童的学习情况、上学目的、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而定,短则一、二年,长则十几年,甚至更长。但从私塾的教育内容来看,私塾一般分为蒙馆和经馆,蒙馆以教学识字、读书为主,对象多为少儿;而经馆以讲授经文,带有私人讲学和研究性质,多以青年为主。清末由于废除了科举制度,以科举为主要教育目的的经馆数量大为减少,相反以识字读书为主要目的的蒙馆最为普遍。从上述60位接受私塾教育的过程看,一般而言他们在蒙馆一是接受启蒙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也就是说完成蒙馆识字读书的教育内容,一般需四到七年¹⁴⁾。再考虑到清末开始实行的新式小学堂的教育年限为5年,故小论把清末儿童一般在私塾的学习年限定为5年。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考察,清末中国各地儿童在7岁左右的时候接受5年左右的私塾教育最为普遍,因此小论把私塾的学龄儿童界定为从7岁到12岁的儿童。

表2 私塾就学经验者的入学年龄

入学年龄	人数	百分比
4岁	3	5.0%
5岁	16	26.7%
6岁	19	31.7%
7岁	11	18.3%
8岁	7	11.7%
9岁	2	3.3%
10岁	1	1.7%
11岁	1	1.7%
合计	60	100.0%

2、学龄儿童数

那么表1所列出的各地7到12岁的学龄儿童数到底有多少呢?从一些史料中虽能获得这些府州县的清末人口总数,但记载有清末人口结构资料即每个年龄阶段的人口构成资料甚少。依笔者的浅见,1928年全国人口调查统计资料是比较详细反映中国人口构成的最早史料。但是这次人口调查虽然设计了各个年龄段人口数量的调查项目,但当时的内务部在发给各省的“户口统计表”里只要求填写6-12岁的儿童数量以及20-40岁的壮丁数量¹⁵⁾。并且这份统计表里只有14个省的人口结构资料,其中浙江省的资

料有部分欠缺,福建省的资料中分项与合计不符,而新疆的人口构成一般认为与内地差别比较大,除去上述3个省资料之后剩下的11省人口总数与6-12岁儿童数如表3所示。

表3 1928年中国数省7-12岁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省别	总人口(万人)	6-12岁儿童数(万人)	6-12岁儿童百分比	7-12岁儿童百分比
江苏	3412.6	548.2	16.06%	13.39%
河北	3123.2	402.6	12.89%	10.74%
辽宁	1523.3	182.5	11.98%	9.98%
陕西	1180.2	150.1	12.72%	10.60%
山西	1222.8	142.3	11.64%	9.70%
湖北	2670.0	228.1	8.54%	7.12%
湖南	3150.1	398.0	12.63%	10.53%
绥远	212.4	18.4	8.66%	7.22%
察哈尔	199.7	20.9	10.47%	8.72%
黑龙江	372.5	50.5	13.56%	11.30%
广西	1364.8	152.3	11.16%	9.30%
合计	18431.6	2293.9	12.45%	10.4%

根据《最近中国人口统计方法及其结果》(1931年)制成

下面根据表3的相关数据,推算私塾7-12岁学龄儿童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如果1928年6-12岁人口结构是均匀分布的话,那么7-12岁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即表3中的7-12岁儿童百分比就可以按“6-12岁儿童百分比 $\div 6 \times 5$ ”的算式计算出来。表3中的7-12岁儿童数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这样,11省的7-12岁的学龄儿童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平均数就约为10.4%。

那么这样推算的依据是什么呢?其合理性又有多大呢?根据黄钟的研究,从清末的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67%^[16],也就是说这个期间中国人口总共增长了 $0.067\% \times 17 = 1.14\%$,因此清末7-12岁的人口构成按1928年的数值进行计算并不会产生太大的误差。

四、私塾的就学率

根据以上对私塾的平均规模、私塾的学龄儿童等的假设、分析和考察,就可以计算出表1所列出的几个州县在近代教育制度成立初期私塾的就学率,其结果如表4所示,但河南确山、登封、新安以及河北永平府、阜平等诸府州县由于清末人口数据不祥,故未列入表4。以下,对表4几个主要数据的来源及计算方法作如下说明:

表4 清末中国几个州县的私塾就学率

地名		私塾数与就学生数			人口			就学率
省名	县名	私塾数	学生数	调查年代	人口	学龄儿童数	调查年代	
浙江	诸暨	790	10,981	清末	458,501	47,684	民国1(1912)年	23.0%
	岱山	100	1,390	宣统1(1909)年	76,601	7,967	光绪25(1899)年	17.5%
	奉化	399	5,920	宣统1(1909)年	327,909	34,103	宣统2(1910)年	17.4%
	普陀	80	1,112	光绪33(1907)年	79,461	8,264	光绪26(1900)年	13.5%
安徽	灵璧	191	2,727	宣统年间(1909-11年)	296,816	30,869	光绪30(1904)年	8.8%
福建	建阳	200	1,000	清末	153,409	15,955	民国1(1912)年	6.3%
山东	即墨	241	4,653	光绪30(1904)年	342,534	35,624	光绪31(1905)年	13.1%
河北	抚宁	227	3,155	清末	280,210	29,142	光绪9(1883)年	10.8%
	赵县	200	2,780	清末	145,283	15,109	光绪9(1883)年	18.4%
	望都	71	987	清末	74,127	7,709	光绪30(1904)年	12.1%
合计		2,499	34,705		2,234,851	232,425		14.9%

出典: 各县私塾数出典与表1相同, 各县人口数根据清末民初各县志制成¹⁷⁾

首先, 表4中的“学生数”为清末各县私塾在校儿童总数, 按数据的来源又分为两类。一是浙江的奉化、安徽的灵璧、福建的建阳以及山东的即墨等四县的私塾在校儿童数, 由于这四县的地方志对私塾就读人数均有记载, 在此直接采用了这些文献记载的原始数据; 二是上述四县之外的各县私塾在校儿童数是按照各县私塾总数乘以13.9而得到的结果。

其次, 因人口资料的限制, 表4中的各县人口数据的大致时期与私塾调查时期不尽一致, 这里既有光绪初年又有民国元年的人口数据, 但两者调查时期相距不甚太远, 因而对计算各地私塾的就学率的误差不致产生较大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 各地私塾的就学率中, 福建建阳县最低, 只有6.3%, 其次是安徽灵璧县的8.8%, 河北的抚宁、望都、浙江的普陀以及山东的即墨等县的私塾就学率都不到14%, 相反浙江诸暨县的私塾就学率超过了20%, 10县的私塾平均就学率约为15%, 这约为当时新式学堂全国平均就学率的2%的8倍。

五、讨论与结论

以上, 小论根据现存的极为有限的清末中国私塾资料、人口资料, 在诸多假设的基础上, 大胆而又谨慎地对清末私塾就学率进行了求证, 首次推算出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成立初期作为旧教育机构私塾的就学率。以下, 小论对这一推算和求证过程作一全面检讨, 并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的结果做出最终结论。

第一、本研究采用了两个最重要的原始数据, 一是各县清末设立的私塾总数, 二是清末各县的人口总数。如上所述, 前一资料来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的各县地方志, 但对这一资料的来源及收集方法等问题, 这些地方志几乎都未作详细说明, 因此其信赖性不得而知。然而, 从多个地方志记载的私塾数都为整数(如浙江岱山的100、福建建阳的200、河北赵县的200)这一点看, 这一数据并非准确数字, 最多只

是各地清末开设私塾的概数。各地人口数据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清末民初各地行政部门对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的方法、操作程序等不太熟悉,调查结果也常受主观影响,因此,上述两个关键数据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证实。

第二、各县就读私塾儿童总数是在“浙江奉化等四县每所私塾的平均就学儿童数,与其它各县每所私塾的平均就学儿童数基本相等”的假设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然而这一假设在小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另外,如上文所述的那样,根据浙江奉化等四县资料求算出来的每所私塾的平均就学儿童数13.9人,其数值可能比实际情况偏大,从而增大了私塾就学率的误差。

第三、中国古代启蒙私塾原本并未对儿童入学年龄及学习期限作统一规定,小论为了量化清末民众就读私塾程度,特此将私塾的学龄儿童界定为从7岁到12岁的儿童。但是实际上小于7岁或大于12岁的儿童仍在启蒙私塾学习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本研究推算的结果应该比私塾的实际就学率偏高。还有表3的人口结构的部分数据超出了常规,如湖北省6-12岁的儿童比例为8.54%,几乎是江苏省的一半等等,这些都影响了推算结果的准确性。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研究求算出来的清末中国各地的私塾就学率应比表4中列出的结果要低,全国平均就学率也应低于14.9%,换言之清末中国民众在私塾全国平均就学率大概不会超过15%。这一点还可从一些零散史料中得到旁证。如前述的湖南溆浦县出身的舒新城在其回忆录《我和教育》一书中写道,他所生活的刘家渡村大约居住了20户左右农家,但能识字写信的只有数人而已¹⁸⁾。另外,1910年学部在《咨覆两江总督提倡导单一教授及设单级教授练习所应准照办文》中,忧心当时新式小学教学方法欠妥,这样“窃恐九年之后,不但识字者难达二十分之一,且将减于现在矣”¹⁹⁾。尽管识字率不等于就学率,但1910年代识字率不到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包括私塾在内的民众就学率应该是很低的。

注释

- 1) 拙文《中国民众初等教育普及状况的考察》,日中教育研究交流会议《研究年报》第14号,2004年7月,pp.65-66。
- 2) 同上文,pp.60-64。
- 3) 同上文,pp.64-69。
- 4) 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上)之“例言”,1907年复制本,文海出版社。
- 5) 原文《支那年鉴》。
- 6) 多贺秋五郎编著《近代亚洲教育史研究》(下卷),岩崎学术出版社,pp.4-10。
- 7) 陈宝泉《我国义务教育之经过及进行》,原载《义务教育》第18号,1923年8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所收。
- 8)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六卷(卷上)。
- 9)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pp.32-35。
- 10) 胡适《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出版,1933年。
- 11) 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中华书局出版,1945年。
- 12) 张金鉴《明诚七十自述》中国行政学会,1972年,p.101。

- 13) 这60人的年谱、回忆录如下: (1)方苞等撰《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 (2)倪会鼎《倪文正公谱》卷之一, (3)吴騫《陈乾初先生年谱》上卷, (4)金镜《金忠洁年谱》, (5)苏元《张扬州先生年谱》, (6)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四卷附校补》卷一, (7)魏荔彤《魏贞庵先生年谱》卷上, (8)魏学澹《魏敏果公(自述)年谱》, (9)申涵煜《申鳧盟先生年谱》, (10)赵之谦《张忠烈先生年谱》, (11)程光祜《李文襄公年谱》, (12)翁叔元《翁铁庵年谱》, (13)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四卷》卷一, (14)李清植《文贞公年谱二卷》卷上, (15)冯辰《李恕谷年谱五卷》卷一, (16)顾镇《黄昆圃先生年谱》卷上, (17)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七卷》卷一, (18)罗继祖《朱笥河先生年谱》, (19)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二卷》卷上, (20)吕培等编《洪北江先生年谱》, (21)蒋筱铤《蒋砺堂自订年谱二卷》卷上, (22)杨芳撰《官传扬果勇侯自编年谱》卷之一, (23)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 (24)《钱宝琛《颐寿老人年谱》卷上, (25)骆秉章《骆公年谱》, (26)程庭鹭《梦盒居氏自编年谱》, (27)赵光《(28)王家口撰《王文勤公年谱》, (29)殷兆镛《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二卷》, (30)郭松涛《罗忠节公》上卷, (31)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卷一, (32)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 (33)滕国《蒋剑人先生年谱》卷九, (34)严树生《胡文忠公年谱》, (35)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 (36)马新佑《马瑞敏公年谱》, (37)罗正钧《王壮武公年谱二卷》卷上, (38)黎培敬《竹间道士自述年谱》, (39)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六卷》卷一, (40)周盛传《磨盾记实》, (41)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六卷》, (42)老乃宣《韞叟自订年谱》, (43)缪荃孙《芸风老人年谱》, (44)金兆丰《晏海澄先生年谱》卷一, (45)韩国钧《止叟年谱》, (46)沈成式《沈敬裕公年谱》, (47)梁焕鼎《桂林梁公先生年谱》, (48)汪康年《汪穉卿先生传记》卷一, (49)张澍棠撰《张提法公年谱》, (50)慎初堂《浏阳潭先生年谱》, (51)唐文治撰《茹经年谱》, (52)张星烺《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 (53)章炳麟《太炎先生自订年谱》, (5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55)赵万里撰《王静安先生年谱》, (56)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 (57)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 (58)胡适《四十自述》, (59)郭沫若《我的幼年》, (60)舒新城《我和教育: 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
- 14) 参见笔者博士论文《近世中日两国民众教育比较史研究》,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pp.170-171。
- 15) 黄钟著, 高桥长太郎译《最近中国人口统计方法及其结果》(支那统计研究资料七), 东亚研究所发行, 1931年, pp.77-78。
- 16) 同上书, pp.52-53。
- 17) 人口数据来源除表中出典之外, 还引用于以下资料:《奉化县志》(光绪34年刊印)、《望都县志》(民国23年刊印)。
- 18) 前揭舒新城《我和教育: 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 p.10。
- 19)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年, p.667。